

双实名制下,文娱演出票“不退不转”成行业新痛点

本报记者 徐艳红



的上门是艺人的经纪公司。艺人的价格如何大家都知道,而主办方要接待的不只是艺人,还有艺人的团队,他们的吃住行全由主办方负责。再者,场馆租金逐年递增。演出一般都安排在节假日、周末,而这时候的场租比平日要贵。还有,演唱会前的宣传预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三是防止同行打恶意竞争战。贾志打了个比方,如果放开退票的口子,他要开一场演唱会,同行为了让他难堪,一下子把门票全部抢完或者抢一大部分。临近演出前又全部退票,“如果这样,我怎么办?”

四是售票平台多,信息不互通,工作量和风险太大。演出票的销售渠道往往是有十几家几十家之多,主办方每天要对接各家票务机构,如果每天都有退票,这个工作量谁都不吃不消。

总之,基于各种原因,演艺行业就有了不成文的不退票或者小部分的有“条件”退的惯例。作为主办方,贾志表示,他并不关心是否实名制,只关心票房。以前实名制时,不能退票的矛盾还没有这么激烈,因为,不退的话还可以转让,但现在实行实名制后,他们只能不退不转不换了。

对所有演出均采用双实名制的“一刀切”的确不利于演出市场的蓬勃发展

去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演出市场在逐渐回暖,今年据《2021“五一”档演出



观察》显示,5天小长假线下专业演出超3800场,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幅均超250%。但实行实名制电子票背景下,大部分演出项目都不支持退票,可转赠项目极少,让用户退改难成为行业新的痛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广播影视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建珍表示,实名制下的退票难问题因实行时间并不长,矛盾可能还没有完全显现,但长此以往,消费者利益受损的同时,对主办单位和票务机构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小处来说,影响观众体验,影响主办方、票务平台的发展;从大处而言,对国家的文娱事业的繁荣都很不利。近年来,整个文娱消费市场都在为消费者创造更宽松便利的消费环境。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协会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电影票“退改签”的通知》,指出电影市场各有关经营主体要明确“退改签”规定,且规定条款尽量细化,做到权责清楚。而同为文娱消费品的演出票至今依然采取不可退制度,难怪消费者怨声载道。不管怎么说,对所有演出均采用双实名制的“一刀切”的确不利于演出市场的蓬勃发展。因此针对实名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张建珍认为,制定更为完善的政策和管理制度是主管部门和行业都亟须探索的方向。

“要完善实名制退改制度,为票品创造正规的流通空间,以解决消费者购票前置而观影不确定的矛盾,从而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张建珍表示,“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提出更高要求,文化产业将成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演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希望能够针对实名制退改制度出台更加完善的政策,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文化消费潜力。

文娱演出票实行实名制欠缺明确的法律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周世虹了解此事后非常诧异,如果说演出票品是有价证券,从没听说过有价证券不能流通不能转让,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很多票品都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稀缺性并不是不能转让和退票的理由,这是违背市场交易规则的。

至于演出票需要实名制,周世虹说他没有找到法律层面的依据,如果为了疫情防

控、方便流调考虑的话,我们的技术手段有的是,比如场馆入口处观众用健康码扫码登记个人信息即可。至于防止黄牛倒票,可以做调研,实行实名制后的成效到底有多少,与文娱事业发展的大局相比孰轻孰重。其实,贾志也表示,黄牛们其实也与时俱进,实名制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周世虹称,这个问题的主要症结其实还是在实名制,实名制是一种管理方式,但未必适用所有场所,借实名制之名来损害消费者权益是不合适的。而且,合同中主办方和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这也违背了合同订立中要遵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他打了个比方,北京要办个演唱会,南京观众提前一个月购票,可7月份因南京突发疫情不能前往北京,北京的演唱会正常演出,南京观众的票不能退,这个损失全部由观众个人承担肯定说不过去。周世虹建议,演出票退与不退应该制定个规则,可以分情况而定,现在这样“一刀切”从合同法制定角度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联合行业协会制定指导意见

希望观众有很好的观演体验是艺人经纪团队、主办方、场馆及票务平台共同的心愿,毕竟消费群体不如电视、电影那么广泛。因此,贾志强调,少部分演出票可以“有条件”退,因为不设置高门槛,退票乱象也会扰乱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今,实名制后把票品转让的路给堵死了,客户少了一个选择,他们也很无奈。

贾志建议,政府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一个指导意见,出台关于退改票的细则,让主办方、票务平台、观众都能在框架内行事。作为主办方,贾志他们其实也尝试过不少办法来解决退改票难问题,比如,2016年曾与保险公司合作,让顾客购买退票险,但后来发现,一是顾客热情不高;二是一场演出观众人数不多,难以支撑起保险那么大的体量,最终只好作罢。总之,贾志表示,任何一家主办方或是票务平台都不敢随意放开退票这个口子。

“但这个行业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堵不如疏,是不是?”贾志说。(贾志和李浩均为化名)

回音壁

委员呼声有回应 稳岗政策得落实

王意

6月9日,《人民政协报》6版民意周刊刊登了笔者撰写的《社会组织应享受中小企业同等优惠政策》一文。文中提到2020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社会组织在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中,主动担当作为,彰显社会责任。在助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却无法享受中小企业同等优惠政策。建议政府部门在今后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时,明确社会组织可同等享受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房租减免、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同等政策待遇。

同时,笔者将该建议报送至民革武汉市委,市委转报至市政协和民革省委会。

文章刊登后,“人民政协报民意周刊”微信公众号也同时予以刊发,笔者将其转发到江岸区政协委员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很快,笔者反映的问题得到市、区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当天就找到笔者了解具体情况并做了相关解释工作。

8月12日,笔者从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经省人民政府同意,8月9日省人社厅发布《省人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退役军人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军区动员局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关于深化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鄂人社发〔2021〕24号),明确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参照实施大小微企业享受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笔者看到这份文件时,十分欣慰自己的参政议政成果能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中得以体现。在这里,要感谢《人民政协报》为基层政协委员提供建言献策的平台,使得建议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并落实。下一步,笔者将继续结合自身专长和优势,积极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积极参加调研视察和协商议政,为政府出实招、谋良策。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政协委员、民革武汉市江岸区工委委员)

江苏无锡锡山区政协:

“商量”到基层,办好民生事

戴亚南

“我每天饭后都会和老伴一起散散步,看到现在社区环境这么漂亮,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近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云林社区居民朱阿姨谈到自家小区面貌时,连连称赞。

2018年以来,无锡市政协、锡山区政协推动建设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锡山区政协推动建设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锡山区政协推动建设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锡山区政协推动建设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锡山区政协推动建设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

到民生一线办实事

云林街道新农丰社区的长泰小区是一个纯商品房小区,毗邻地铁2号线九里河公园站。随着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原有的基础设施已不够使用。“居民们希望在小区附近的广场上设置便民座椅,供老人和孩子歇歇脚。”社区党支部书记宣巨说,虽然增设几张座椅看起来并不是“大事”,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代表来“商量”:资金从何处来?后期维护谁负责?座椅需要多少张?位置放在哪里更合适?……

为了把这件民生“小事”办得扎实,锡山区政协委员李永平与社区干部、居民代表来到现场踏勘调研,对所需座椅数量和设置地点有了初步了解。在随后的协商议事会上,大家纷纷提出建议。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增设25张便民座椅的民生项目很快敲定,“资金已经落实,招标也已完成,马上就会开始施工,后期的管理维护也有了方案。”宣巨说。“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为政协委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履职平台,使委员们更深入地融入基层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并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到生产一线促安全

云林街道辖区内共有1700余家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占锡山区总量约50%。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的过程中发现,经营者的安全生产意识参差不齐,一些中小企业存在安全隐患,而少数企业主面对隐患束手无策。

既要严守安全红线,压实安全责任,又不能“一棍子打死”。于是,政协“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就成了党委、政府狠抓安全生产的“好帮手”。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挂钩云林街道的17名市、区政协委员轮流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每周安全生产夜间巡查行动,截至目前,共巡查20次,每次夜查企业2至3家,共查出隐患135条。

政协委员参与夜查安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到场检查,而是把“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开到了安全生产的现场。无锡市政协委员许运枫就是一名企业家,多次参加夜查的他深有感触:“我们的巡查是‘建设性检查’,每次查到问题都要帮助企业查找原因,制订整改措施,让经营者更好地经营企业。”就这样,20多次夜查,变成了20多场微型现场的“协商会”,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技术专家、企业家们现场查找问题,现场提出解决方案,并现场开展民主监督,有力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云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协工委主任倪志刚说,这种“在现场、马上办”的协商议事会,拉近了政协委员与群众的距离,如今已成为云林街道17名挂钩政协委员的履职新常态。

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利益相关方代表相聚“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共同经历和见证每一次协商议事活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践行,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认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截至目前,云林街道先后建成使用1个街道协商议事室和11个村(社区)协商议事室,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32次。

“惠民惠农补贴”缘何成了“唐僧肉”

胡建兵

2021年6月开始,湖南省纪委监委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问题专项监督检查,通报了7起典型案例。这7起典型案例反映出党员干部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管理过程中,有的履职不力,监管不到位;有的违规操作,改变资金用途;有的搞“微腐败”,虚报套取、非法侵占等。(8月11日中新网)

本来是惠民惠农的财政补贴资金,反而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近年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涉及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各项补贴,特别是扶贫涉农资金堪称农民的“救命钱”,

然而随着各类惠农惠民资金拨付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救命钱”却成为一些基层干部渔利的目标。厕所改造里面能生财,病死猪肉可囤钱,死人常领低保金,水利工程是财源……有的通过编造资料、虚报土地面积套取补贴;有的通过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用于补贴其行政运行费用;更有甚者,连已经死去多年的困难补助对象都不放过。

如龙山县红岩溪中心林业管理站原站长田吉龙侵占退耕还林补助资金8900元用于个人开支;邵阳县塘田市镇首八村党支部村委会违规拆分低保金4.66万元;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高坪村委会原

主任贺世华套取家庭农场补贴专项资金3.92万元;沅陵县北溶乡朱红溪村党支部村委会违规账外使用护林员管护费18.26万元……

出现这样的问题,关键是扶贫涉农资金的支付、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基层农业管理部门、乡镇干部和村干部手中的权力也不断增大,而相对应的监督却没有跟上,部门内部不敢监督,上级监督又流于形式。一些监督机构成了“不下轿”的“钦差大臣”,有的资金审批发放部门成了闪转腾挪的中介。为了套取补贴,有人花钱租羊圈养殖大户,有的猪圈

办酒厂变身企业家,有的购买专利变成“科技能人”。

政策性腐败是指在制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过程中,借政策之名假公济私,将政策异化成谋利平台的腐败行为或腐败现象。当前,违规性腐败的空间在缩减,而政策性腐败势头在上升,尤其是涉农领域。由于这些腐败有政策作依附,更具伪装性,成了“能摆上台面的腐败”。

补贴本无罪,但不能成为一些人嘴边的“唐僧肉”。除了严明法纪,加强相关人员的监管,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之外。最关键的是各种补贴发放必须公开化、透明化,从源头上加以有效防范、堵塞漏洞,不给一些人权力寻租的机会。